



现代 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A·И·别尔丘克著

（周期性的、中间性的和结构性的）

東方出版社

А. И. Бельчу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КРИЗИ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Циклические,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译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周期性的、中间性的和结构性的)

XIANDAI ZIBENZHUYI JINGJI WEIJI
(ZHOUQIXING DE、ZHONGJIANXING DE HE
JIEGOU XINGDE).

著者/[苏]А. И. 别尔丘克

译者/雒 堃、许宏治、潘德礼

校者/李芳春

封面设计/马少展

发行/东方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六〇三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9.25 字数/222,000

版次/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8,000

D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书号 4453·10

定价 1.90元

序 言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战后危机和周期的问题占有特殊地位。无论在苏联，或在其他国家，已就这个问题写出了几百部书，但是，尽管有如此大量的研究著作，而人们研究的兴趣却未尝少煞。这里有很多原因。发展的矛盾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资本主义的许多特点，如果不考虑这一社会形态范围内生产发展的周期形式，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

一百多年以来，危机和周期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学说之间进行原则性论战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向竭力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按期发生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却是这个经济制度固有缺陷的最有力的证据。在这种制度下，一极是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极则是闲置和开工不足的企业。同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也被大量不能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早就试图寻找一种医治这种制度病症的有效手段，因为他们很清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斗争中和经济竞赛中，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的份量。他们特别注意个别国家发展的那段时期，即同其他历史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缴纳的“危机贡赋”相对地要少的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中期，对某些国家说来便是这样的时期。西方某些人士甚至开始武断地说，经济危机和周期已在逐渐“消亡”。正如分析表明，从一般经济增长速度看来，即便是对资本主义比较有利的时期，这种断言也不符合真实情况。七十年代的剧烈的危机过程，使这种幻想彻底烟消云散。

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也许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和周期的整个历史中,周期发展的特点没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显著。苏联经济学家最初对这个事实认识不足。他们试图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周期史的尺度出发来估价发展的进程。当偏离这些标准时,每每解释为偶然的和过渡的现象,至于其原因,则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中,以及在资本主义经济军事化中去寻找。然而,从五十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1957—1958年危机以后,开始暴露出这些变化并不是短暂的现象,而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周期发展的稳定的特征。在六十年代已彻底明确,偏离准则便是这个时期的准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战后危机和周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苏共历届代表大会,特别是第二十四次、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以及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献中,都包含有关于现代危机和周期的重要理论原则,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状况,总结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对七十年代的新现象做了结论。这些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新成果为根据的,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战后时期,苏联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其中既有论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关系一般问题的,也有分析周期和危机(包括结构性危机)的。这个课题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苏联外贸部全苏研究所、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书刊中,都做了论述。这些机关就战后危机和周期问题、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问题,以及结构性危机问题多次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材料中包含有许多重要观点。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特点通常并不是研

究的主要对象,但是,许多著作不论在阐释国别特殊性上,还是在揭示一般规律性上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苏联学者所发表的著作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下作者的作品,如:Е·瓦尔加、В·格拉西莫夫、А·格列奇欣、С·达林、М·德拉吉列夫、Ю·叶尔绍夫、Н·伊诺泽姆采夫、Н·孔德拉季耶夫、И·库兹明诺夫、Г·库马宁、М·马克西莫娃、А·马努基扬、С·梅尼希科夫、П·门德尔逊、А·米列依科夫斯基、Я·佩夫兹纳、Ф·皮斯科佩尔、Э·普列特尼奥夫、Ю·波卡塔耶夫、Е·普里马科夫、В·雷马舍夫、И·特拉赫滕贝格、А·弗鲁姆金、П·赫沃伊尼克、А·齐吉奇科、В·舍纳耶夫、Р·恩托夫和А·尤达诺夫。^①

社会主义各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学者们,如:Е·博戈纳尔、А·布鲁热克、Т·弗拉基米罗夫、Р·格札、Ф·科兹玛、Г·科尔曼、Я·科瓦切维奇、М·卡列茨基、Э·柳杰曼、Г·莫捷克、Ф·莫利纳尔、О·赖因霍尔德、Г·里德尔、Т·特兰达费洛夫、В·霍尔瓦特和М·施密特等人,对战后周期和危机的世界经济问题和七十年代的结构性危机都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尽管对我们所考察的问题已经有许多深入研究的成果,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一系列战后周期的重要理论问题是有争论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加以阐述。这也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① 例如,请参阅,Л·А·门德尔逊,《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59年版;И·А·特拉赫滕贝格,《货币危机(1821—1938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现代周期和危机》,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7年版;Е·С·瓦尔加,《经济危机》(选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年版;《美国经济周期和机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С·М·梅尼奇科夫,《通货膨胀和经济调节的危机》,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9年版;Г·М·库马宁,《资本主义周期的本国和国际过程的互相联系》,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周期发展的复杂性和异常性。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其他部分,大概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大量的不同观点吧。在原则上说来,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并不是什么“坏事”。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在各种意见的比较中得到发展,而且不言而喻,这种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范围内进行的。然而,同时不能不指出,过多的意见分歧说明许多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是:战后周期的分期、各种类型危机的标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对周期的实际影响、工业周期中资本积累变化的作用,以及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不仅妨碍对过去和现在的发展的理解,而且也不利于揭示将来的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一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建立战后危机和周期的完整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集体努力的结果。本书的中心内容是论述周期性、中间性和结构性的危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非常重视危机,这并不是偶然的。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表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发展过程的调节器的和发动机的职能。这取决于历史进程的辩证性质。在以对抗性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中,向另一种质的崭新状态的过渡,只能是通过冲突的、危机的方式。矛盾的类型及其所包括的领域视危机的程度及其所行使的职能而定。危机的类型多种多样。广义说来,革命也是特种危机,它使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危机和包罗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的危机。这种危机所表现的解决矛盾的形式,只能是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这种过渡要包括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经济危机可以分为周期性危机、中间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个别领域中的危机(如货币-金融危机)。

质的“崭新状态”可能是危机的后果，这一概念是相对的。这种概念取决于据以确定新状态的现象。历史变化的最高级，是由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展的观点，周期的更替是由一种质的状态过渡到另一种质的状态，虽然从最高级的历史变化看来，这意味着在原来质的状态范围内的变化。危机所引起的较低级的变化，意味着在原有制度存在的范围内部份地适应制度的尝试，是适应发生了变化的条件的形式。适应过程的是否成功，取决于该制度客观适应的可能性和统治阶级对变化必要性的主观认识与实现这种变化的实际能力。例如，周期性危机是解决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的形式，但这个解决仅是下次危机到来之前部分的和暂时的解决。即便这样，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它的对抗性矛盾就为适应这一社会制度设置了某种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各种类型的危机都执行着“历史火车头”的职能，只不过是其类型和前进的方向不同而已。

在经济危机的等级中，周期性危机占着中心的地位。这种危机的职能，广义地说来，是整个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和消费、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及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的强制的“调节器”。归根到底，危机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降低生产费用，因为公司力图寻找摆脱经济困难的出路，积极生产新产品和采取新工艺。临时解决矛盾的强制办法，为固定资本更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扩大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危机被认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下一周期的主要特征、固定资本更新性质等等的阶段。

当然，危机的这种职能是以很高代价取得的：暂时停止发展和甚至部分地消灭生产力。资本主义作为建立在对抗性矛盾上的社会，其动力必然是冲突性的和破坏性的过程。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当提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经济衰

退这一事实时，就曾指出这个问题。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便是如此。中间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也是本书将要分析的其他主要课题。直到今天，在苏联的著作中，对周期性危机和中间性危机并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不少研究人员根本不对这两种危机加以区别。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回答在周期与危机理论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至今仍然有争论的问题，如：战后周期的分期，危机间隙时间的长短和深度的判断，以及周期阶段的特点。本书将要提出中间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的标准体系，并据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周期进行分期。

为了确定标准，必须解决一系列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作者认为是以下这些问题：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到什么程度，才能行使危机的职能？作为周期形成因素的固定资本积累变化的作用何在？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固定资本更新乃周期物质基础的原理？

涉及整个战后时期的这些理论问题尽管非常重要，但对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过程的研究却使人怀有浓厚的兴趣，虽然只有在总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弄清楚工业周期的变形和这些年代的其他特点。在许多方面，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整个战后时期发展的转折点。

从许多方面看来，七十年代的危机过程是不寻常的。

一方面，我们首次遇到了战后时期一系列最重要的特点，例如周期性危机阶段的不同期性的消失，危机首次袭击了西欧和日本，而且其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

另一方面，上述危机过程中包含有一系列重要的新现象，这些现象以前都没有察觉到，而且远远超出周期性危机的范围。这些现象是：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以及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诸因素的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的新作用，发展中国家开始争取在世界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改变自己的地位，国家垄断调节经济的过去体系的危机和一系列其他重要因素。

1974—1975年的周期性危机和伴随着它的非周期性危机过程之所以引起人们特别注意，是因为它在研究人员面前提出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长期趋势问题：这些过程是否意味着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科技进步的步伐放慢，经济中和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中发生新的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或者过一些时候，这一切又会重复一次呢？

在苏联和在其他国家，就这些问题写了大量的文章，但大多数是报刊性质的文章，而不是专著。本书除对七十年代危机过程作一般阐述外，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问题中的结构性危机。在七十年代中，结构性危机的意义明显地增长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直到如今对结构性危机的概念还没有下过定义。往往把周期性震荡范围之外的差不多所有的危机，从货币-金融危机到生态危机都算作结构性危机。本书试图对结构性危机的标准下一个定义。对结构性危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部分理论问题，将同原料危机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直到现在，甚至对于在七十年代末期是否有过这种危机或仅仅是七十年代中期的特点这一问题上，在所有文章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运动，不能只在民族经济范围内加以考察，尽管周期首先是由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条件所决定和产生的。在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周期和危机便越出了一国的范围而成为世界性的。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式及其危机震荡的形式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有关，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同后者有关。因为，按其本质说来，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

七十年代中期的危机过程，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了特

殊作用。这些过程不仅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重要的客观现实。它们还标志着某种更大的事件：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新时期的开始。

资本主义的经济史不仅是而且主要是以工业周期为特点。这部历史分为若干时期，从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向、经济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特定国家集团的状况、经济生活中国家的作用及其利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的手段、信贷-货币领域的状况、周期发展的特点等等看来的一般特点，是有代表性的。如果谈到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可以将它分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1933年危机，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期。自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也出现了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其内部有很大差别。七十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个延续差不多二十多年的很长时期，从而开始了战后发展新阶段的篇章。

本书常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按本质来讲，一切社会学科都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们经常要同变化中的研究对象打交道，要同由于社会发展而起的变化规律打交道。同时，甚至在最彻底破坏和最大震荡之后，任何时期都不是完全重新开始。现在同过去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有时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有时是从新的一章开始，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一页和这一章都是同一部书的，而且这部书很久就开始了，这便是人类社会史。然而，本书对过去的研究并不是目的本身，只不过是借以更深入地了解现在和展望将来的一种手段。本专著由于是对较长的一段时间进行分析，所以常采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作者在此对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A·特卡琴科、E·雅科夫列娃和B·托波利亚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她）们在为本书准备资料时给了作者很大的帮助。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中期 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周期发展	1
一、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 基本特征	1
二、决定战后周期特点的各种原因	11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间性危机和 周期性危机	35
一、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波动和危机。固定资本 积累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工业周期的影响	40
二、中间性危机和周期性危机的标准	55
第三章 战后周期的分期	77
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周期	78
二、战后世界周期的分期	109
三、战后世界周期评述	126
第四章 七十年代的危机过程	146
一、总论	146
二、七十年代后半期投资周期的特点及其原因	162
第五章 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危机	184
一、结构性危机的本质	184

二、原料危机	194
三、能源危机	242
四、粮食危机	269
结论	281

第 一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中期 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周期发展

一、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周期和危机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发展同其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分析资本主义整个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试图去理解战后时期的周期和危机震荡的特点，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前者是内容，只不过披着周期运动形式的外衣而已。毫无疑问，这个内容对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必须指出，同战前时期比较，工业生产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加快了。如果从1920年到1950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平均增长了2.4%，那末，从1950年起的二十五年中增长速度为5.5%。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额的实际增长速度方面，相应的数字为2.5%和6.9%。比较这些数字时必须考虑到，从经济发展速度的观点看来，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对资本主义最不利的年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速度的加快，有三个主要原因：科学技术革命、国际分工的加深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节经济生活的加强。

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性，而且也取决于两个对立社会体系的竞争在世界上形成的新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这些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帝国主义大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主义生存的本身提出了问题。从远景说来，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可能性虽然已很明确，但毕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可能性已经感到是一个可以触及的现实，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了。

在这种条件下，统治阶级拼命动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资源，以便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削弱经济震荡、缓和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也在资本主义内在规律表现的性质上打上了某种烙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科技革命直接地触动了经济的所有领域。它采取了各种形式：新的、先进的部门和生产的出现及其比重的增加，新的管理生产方法的实行，科学直接变为生产力，科研费用的大量增加，在生产中掌握科学和技术成果的时间缩短，等等。

科技发明只有当它为社会需要时才能得到实际的应用，而其中许多东西也只有到需要时才能制造出来。这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蒸汽机被发明了许多次，但仅在经常需要廉价发动机的情况出现时才开始被广泛地利用。其他许多发明，也都如此。然而，不应低估科技进步对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反作用。通过竞争，科技进步成为一种强制的力量，它促进生产结构的变化、新的管理原则的采用、固定资本更新的加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技进步对于产生它的力量具有某种独立性，并带有一种通过其内部发展规律来自行加速的倾向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进步有了这样大的规模，竟变成了一场科技革命。其

规模、意义和社会-经济后果，也许只有十八世纪末叶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可与之相比拟。

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分工的加深和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生产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迅速扩大。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作为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加快的一个因素，它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1955年到1975年的二十年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比其社会产品的增长要快50%以上。科技进步的急剧发展和加深，使其变成了一个国际过程，这就要求每个国家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国际专业化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有限范围内集中力量和资金投入对其最有前途的部门，并且能够利用优势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对西欧和日本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相对有限，不能成为大规模生产许多种产品的足够的基地。但是，对外经济联系的作用对于美国这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显著地提高了。美国在物质生产出口上所占的份额由1960年的7.3%增加到1976年的14%。^① 对于这种过程相对慢的美国来说，这是相当高的速度。

最近十年的特点是，各国间科技交流在急剧扩大。许可证和专利权的贸易比对外贸易的增长快得多。

对外经济联系的集约化，一方面推进了资本主义的（首先是西欧的）一体化过程，另一方面一体化过程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快了集约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总的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调节及其各种各样的干涉手段。

^① 《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第434、865页。

这种调节,目的在于减少行情波动、加快总的发展速度、缓和社会冲突等等,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为,国家是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和“守夜人”,现在却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狱官和经济生活的直接参加者。以往的国家职能已经不能保证垄断组织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思想家都力图解释战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宣扬国家“万能”的思想。他们不否认资本主义的病症(因为这是无意义的),但是却断言,在“正确的”政策下,他们能够医治,首先是国家方面能够医治,因而主要的任务便在于寻找“对症的”药方。

这并不是新观点,但归根到底资产阶级的辩护理论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没有找到,而且正如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不可能找到治疗资本主义“病症”和缺陷的灵丹妙药。

整个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和整个经济发展的一般特征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中期。当然,现在还很难说,在七十年代出现的趋势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留到将来,但是毫无疑问,转折已经很明显了。过去的三十年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按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周期的特点看来又可划分为各有其特征的一系列时期。四十年代后半期同社会急剧发展的七十年代前半期(到1974—1975年危机时期)有所区别。三十年的时间即便是用发展比较慢的十九世纪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何况,对工业周期说来,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三十年当作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较,危机没有那么深刻,因而通常也没有那样漫长。如果拿战后时期危机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美国

来加以比较，工业生产下降的最低点在1948—1949年为7.9%、1953—1954年为8.2%、1957—1958年为12.6%、1960—1961年为4.8%、1967年为2.1%、1969—1970年为8%、1974—1975年为15.5%。^②

如果以整个工业生产产量波动的数字来比较，那末，1949年、1954年、1958年、1961年、1967年、1970年和1975年同其上一年比较则相应为-6.7%、-5.2%、-6.3%、+1.2%、+2.3%、-3.9%和-9.2%^③，而整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相应地为+0.8%、-1.1%、-2.9%、+3.4%、+4.1%、+2.0%和5.9%。

必须指出，仅仅根据工业生产指数来测量危机震荡的深度是片面的，而且也不能对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的程度得出充分的答案。这个问题将在本书以下章节里专门予以论述。作者在这里并不想提出一个目标：准确地测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危机深度。眼下的论述只是确定一个一般的概略的比例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仅用一个指数即工业指数，依我们看来是可以允许的。特别是这个指数是最重要的指数，它是长时期的可比指数，因而也有很大的意义。其他许多统计数字，以前通常是当作行情（价格、股票行市）的晴雨表来估计周期运动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数字已不太可靠；现在特别集中使用的一些统计数字（如订货、储备），以前一般是不计算的。

同战前的危机进行比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久以前新实行的工业生产月指数，特别是调整过季节性波动的指数，使你能够分析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不去冒将周期波动同季节性波动混淆在一起的风险。研究战前的周期，差不多完全根据年统计数字。因此，

② 按照调整过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季节性波动的每月指数计算的。

③ 《美国统计摘要》有关年代的统计数字。